

# 从凌家滩玉器外来文化因素看淮夷文明的形成<sup>\*</sup>

石荣传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市 410082)

**关键词:** 凌家滩; 玉器; 外来文化因素; 淮夷文明

**摘要:** 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大陆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空前繁盛, 族群迁徙异常频繁, 地处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的淮河流域成为史前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汇聚地, 致使淮河流域的文明进程梳理异常复杂。本文通过对江淮中部的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进行考古文化因素分析, 阐明凌家滩人在周围多方强势文化下, 吸纳先进的文化因素, 进行重组与构建, 及通过外来文化因素看凌家滩人复杂的族群构成。从而可以了解淮河文明形成的方式, 及淮夷人的构成, 对于梳理淮河流域整个文明进程或其他地域文化谱系都有参照作用。

**Key Word:** Lingjiatan; jade; foreign cultural; factors Huaiyi civilization

**Abstract:**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s had been more flourishing and rapid in mainland east China. In the middle of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Huaihe region was compulsory area for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s. So the civilizing process was very complex. Here, with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factors analysis of jades excavated from the Lingjiatan site in Anhui, we understand that how humans of Lingjiatan had absorbed, restructured, built on the basis of many cultures. In the other hand, the ethnic of Lingjiatan include many population migrations from other area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the lingjitian culture, the process of the huaihe civilization was clear.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7.02.005

新石器时代晚期, 社会结构急剧转型, 人为或自然因素的族群迁徙异常频繁。淮河流域成为黄河与长江文化传播的汇聚点。以往的考古学研究, 淮河文明多被纳入长江或黄河文明体系中。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诸多学者已认识到, 虽受黄河或长江文明影响, 但淮河文明应是中国“多元一体”文明中的一元。由于地处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 受周围文化的多重影响, 淮河文明进程异常复杂, 多种外来文化因素杂糅相合, 各小区域内又自成体系, 相互之间多有互动, 形成了复杂的“多元一体”格局。

要理清淮河流域复杂的文明进程, 必须找到最具代表性的一环, 剖析其形成过

程, 由小见大, 由内向外的把握淮河文明的脉络。安徽含山铜闸镇凌家滩遗址<sup>[1]</sup>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从贫富悬殊的墓葬、规模较大的祭坛、造型种类异常丰富的玉器等都可以看出, 江淮中部的凌家滩人已踏在文明的门槛。作为凌家滩人神秘的原始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 凌家滩玉器除极具自身特色外, 某些器物的外来因素也极为明显, 如长江流域的璜、玦等, 再如海岱文化因素浓厚的玉鹰、玉龟与刻纹玉板组合、玉龟组合器等, 丰富多样的外来文化因素为我们撬开淮河流域复杂文明进程的冰山一角提供了可能。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sup>[2]</sup>, 本文对玉器, 间以陶器进行梳理, 分析其外来文化因素,

<sup>\*</sup> 本文受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及贵州省2016年哲社规划国学单列课题(16GZGX19)资助。

看凌家滩文化吸收、重组了哪些外来文化，凌家滩人接纳了哪些外来族群，管中窥豹，看在多种文明影响下，淮河流域如何自成体系，从而侧面了解淮夷族群的起源与构成。

纵观凌家滩玉器，造型、种类与长江下游玉文化有着较强的相似性，内涵又多有海岱文化因素，另外，与东北地区、江淮其他地区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文化因素很难严格划分，但为了论述方便与清晰，按主要外来文化因素，本文大致划分如下：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宁镇地区、海岱地区、东北地区等。

### 一、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文化因素

凌家滩遗址地处淮南丘陵以南，江淮中部，地理位置偏近长江下游，文化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较多的相似性。

目前来看，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的史前文化可能是整个长江玉文化的源头，如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凌家滩玉器中大多器形，如璜、玦等，直接来源于上述文化。但崧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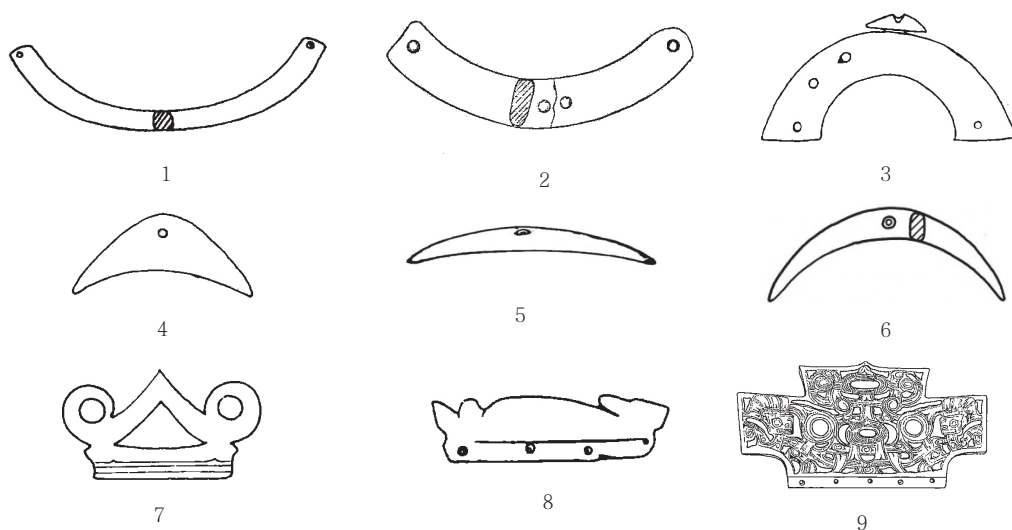
晚期及良渚时期，成熟的凌家滩玉文化反作用于这一地域，如月牙形器、冠形器等，具体论述如下。

1. 素面弯条形玉璜 凌家滩遗址此类玉璜出土较多，圆弧状或中间较直的桥形，剖面为扁圆体或扁平体，以前者为多，如87M15:93。（图一，1）

玉璜是长江流域特有玉器造型之一。弯条形玉璜最早见于马家浜文化<sup>[3]</sup>。造型精致，如湖州邱城遗址T103③:34<sup>[4]</sup>，浅黄色，半透明，打磨精致，剖面呈扁圆形，两端各钻一孔。后为崧泽文化继承，并沿长江逆流而上影响江淮、长江中游等地，以扁方体为多，如巫山大溪文化M123:11<sup>[5]</sup>。（图一，2）

太湖流域崧泽文化晚期此类玉璜衰落<sup>[6]</sup>，其他地区仍然流行，是凌家滩、北阴阳营、大溪等文化璜的主要造型。

2. 素面半璧形玉璜 这一器形时代上晚于素面弯条形玉璜，最早出现于崧泽文化，是该文化中后期的代表器形。影响范围广泛，从宁镇地区、江淮地区至长江中游，各遗址时



图一 太湖流域及以南文化因素相关器物  
玉璜：1. 凌87M15：93 2. 巫M123：11 3. 凌87M11：4 玉月形器：4. 凌98M29：32 5. 薛M19：3 6. 东D2M1：34  
玉冠形器：7. 凌87M15：38 8. 凌87M10：7 9. 反M16：4

有出土，如巫山大溪文化M123:8，良渚时期仍然流行。凌家滩素面半壁形璜出土不多，数量上远远少于弯条形玉璜，以98M28:2较有代表性，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相比，制作极为规整。

总体说，凌家滩玉璜直接受太湖流域玉文化影响，除承袭原有器形，如素面弯条形玉璜、半壁形玉璜外，还在原有器形上加以改进，形成凌家滩独有的器形，如87M11:4（图一，3）与M87M10:8，即在弯条形玉璜两端或外缘中间琢磨菇状或刻齿牙。

3. 玉玦 凌家滩玉玦出土较多，也较集中，如07M23出有34件玉玦，占墓中玉器总量的17%。出土位置除头部两侧外，还见于胸部。因此除耳饰外，当有其他功能。

凌家滩玉玦除中孔特大玦外，与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玉玦极为相似，尤其是凌87M8:16玉玦，有切而未断的缺口，与河姆渡文化余姚遗址T234④B:301、T1④:86<sup>[7]</sup>造型基本一致，只是体形稍大而已，当与河姆渡文化有某种渊源关系。

从目前来说，玉玦分布范围多集中于东亚地区，以兴隆洼文化年代最早，有学者认为东亚玉玦起源于此<sup>[8]</sup>，其他地方受其影响，这种说法有待商榷。虽然东北地区与长江流域玉玦兴盛，但二者之间的海岱地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都不流行玦类饰物，传播路线有太多的缺环。

4. 玉月形器 凌家滩98M29:32（图一，4）月牙状，一侧有一未钻透的孔，与南河浜<sup>[9]</sup>M17:2（报告称璜）极为相似。时代上，凌家滩98M29开口于③层下，打破生土，属于凌家滩遗址早期，南河浜月牙形器约为崧泽文化晚期，晚于前者。另外，薛家岗M19:3<sup>[10]</sup>（图一，5）也为月牙形，墓中没有陶器，不知其相对年代，但薛家岗文化四期才开始流行玉器，明显晚于凌家滩早期。

因此，月牙形器以凌家滩为最早，太湖流域及其他地区当是由其传播而来。

令人深思的是，东周越墓经常发现月牙形器，如东阳前山D2M1<sup>[11]</sup>，（图一，6）墓中出有玉、萤石、水晶、绿松石等质地的月牙形器108件，A型与凌家滩、南河浜、薛家岗的月牙形器十分相似，当由史前发展而来。

历史时期，太湖流域为越地，月牙形器当属越式玉器，其他地域的同类器物<sup>[12]</sup>是由越文化传播而来。而史前玉月形器的出土说明两点：首先，越式玉器的萌芽当在更远的史前；其次，先越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有太湖流域古越人，远在江淮的凌家滩人也参与其中。

5. 玉冠形饰 凌家滩文化的冠形饰仅有2件，造型极为特别，87M15:38，（图一，7）器顶端呈“人”字形，“人”字的两撇向上卷为圆环，长方形底座，有三阴刻线，两端各一孔。87M10:7（图一，8）（报告称为兔形玉饰），上部两侧各雕不对称凸起，下部磨出榫部，上钻有四个圆孔。二者造型略有差别，但都有榫，榫上都有孔，从出土位置与凌家滩玉人头部冠形饰看，此类器物当为地位较高人的头部装饰。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M17<sup>[13]</sup>出有一件（报告称双人首三环形玉器）玉器，中间为三个大圆孔，两侧各雕琢戴高帽的人首，其下有榫，上有三孔，当是插于它物上的装饰品，可能亦为冠形饰。

长江下游玉冠饰晚于凌家滩文化，最早见于良渚文化早期张陵山WZM4:03<sup>[14]</sup>，与凌家滩玉人头部冠饰相似，造型简单，下部有榫，榫上有孔。良渚中期玉冠饰流行，器形成熟，多为倒梯形，上宽下窄，下部有榫，带孔，其上多刻划纹饰，如反山M16:4<sup>[15]</sup>（图一，9）神人兽面纹刻划在器面中间，以鼻为中轴分开，兽面纹置于中间，显示神人能分能合的超能力，喻意拥有冠形饰的人也

拥有或神人将赐予这种能力。

随着浙江盐城周家浜遗址<sup>[16]</sup>象牙梳的出土，冠形饰为梳脊背的功能尘埃落定。凌家滩、红山文化的玉冠形饰，从有榫有孔看，不排除为梳脊背的可能。

无论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都是以“神”玉为载体高度发达的原始玉文化，冠形饰都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是承载着宗教或权力寓意，或军权或神权，或二权合一。

总体来说，凌家滩玉器造型种类方面，源头当在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是凌家滩文化的根基所在。崧泽晚期，成熟的凌家滩文化反过来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影响。

另外，从冠形饰看，凌家滩玉文化还参与了良渚玉文化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凌家滩87M4:53玉镯（玉箍形器）与87M15:52~63竹节状玉管可以作为辅证，前者与瑶山M11:66<sup>[17]</sup>几近相同，后者与福泉山M9:38、M9:40别无二致<sup>[18]</sup>。

从下文宁镇地区多无冠形饰、玉月形器等情况，巢湖地区与长江下游的文化交流应有多条途径，一为沿长江而上，二是太湖流域直接而来。后者多是直接输入，而前者要通过宁镇地区，即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文化因素部分由宁镇地区文化挟带而来，即次生文化因素。

## 二、宁镇地区文化因素

宁镇地区地处长江沿岸，隔茅山山脉与太湖平原毗邻，处于长江与淮河下游的要冲地带，属广义江淮地区，也是海岱与太湖流域的交通要道。文化属性更多为长江文明，与太湖流域及以南地区文化紧密，除此之外，还受北来的海岱文化，西来的长江中游、江淮地区等文化影响，从北阴阳营二期文化开始自成体系<sup>[19]</sup>。

相比于太湖流域对凌家滩文化的源头作用，以北阴阳营二期为代表的宁镇地区玉文化与凌家滩文化有更多的亲缘关系。择其典型玉器论述如下。

1. 分体玉璜 首先界定一下分体玉器的概念，一般来说是指人为将完好的玉器断为几块，缺口较平齐、规整，加以钻孔，可用绳索连接，包括玉璜、玉璧等。从连接方式可分为两类：（1）直接在器面上钻孔，是各文化最为普遍常见的一种，如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sup>[20]</sup>、薛家岗文化等，这种方法可能来自玉器断裂后的修补技术。目前来看，这种分体玉器以河姆渡文化为最早，如余姚T242④B:325<sup>[21]</sup>，一端有孔，制作精致，钻孔与末端之间的器表两面各有一沟槽，打磨光滑，显系加工而成，似为分体玉璜的一半，凌家滩87M10:18即为此类。此技法成熟于崧泽文化，如南河浜遗址M16:6。（2）在断裂处侧面钻孔，间有暗槽相连，如北阴阳营M191:1<sup>[22]</sup>，（图二，1）正面看不见绳子与孔，整器更加美观、耐用。凌家滩分体玉璜皆属此类，多以素面弯条形玉璜为祖型，在璜两端加琢兽首，如87M9:18。（图二，2）偶有素面，如87M1:4。（图二，3）正如学者所称<sup>[23]</sup>，这种玉璜当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或符类或信物。

祁头山遗址<sup>[24]</sup>、北阴阳营遗址都有出土，皆为素面弯条形玉璜，与凌家滩87M1:4相似。前者仅出一件H1:1，后者数量较多，有16对和12个个体，16对系由两段完全相同的部分组合而成。从年代看，祁H1属于祁头山第四期晚期，北M191属于北阴阳营遗址第④层，二者年代相近，相对年代为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约6300年，都早于凌家滩遗址。从凌家滩遗址分体玉璜看，素面较少，以两端加兽首为主，应是在宁镇地区分体玉璜基础上的改进。

此种分体玉璜多分布于在以宁镇为中心的附近地区，虽然地理划分上，祁头山属太湖平原，但它与宁镇地区同在长江主干上，而且茅山山脉仅高200~300米，地势较低，又受相同文化影响，如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江淮东部等文化，因此二者文化属性十分接近。江苏金坛三星村<sup>[25]</sup>M889:1玉玦，也有此种连接方式，应受宁镇地区影响而至。

如果分体玉璜有符或信物的含义，那么5300年前，这种璜就不只是佩饰这么简单，而应是代表身份、地位，甚至某种约束力或权力。

2. 中孔特大玉玦 在凌家滩玉玦中，87T11③:8(图二，4)显得较为特殊，外径有7.3厘米，中孔特大，且孔偏于一侧。

中孔特大，且孔偏于一侧的玉玦并不多见，宁镇地区仅见北阴阳营遗址M144:1(图二，5)、江苏金坛三星村M909A:16。时代上北M144大体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金坛M909属于该遗址第二期，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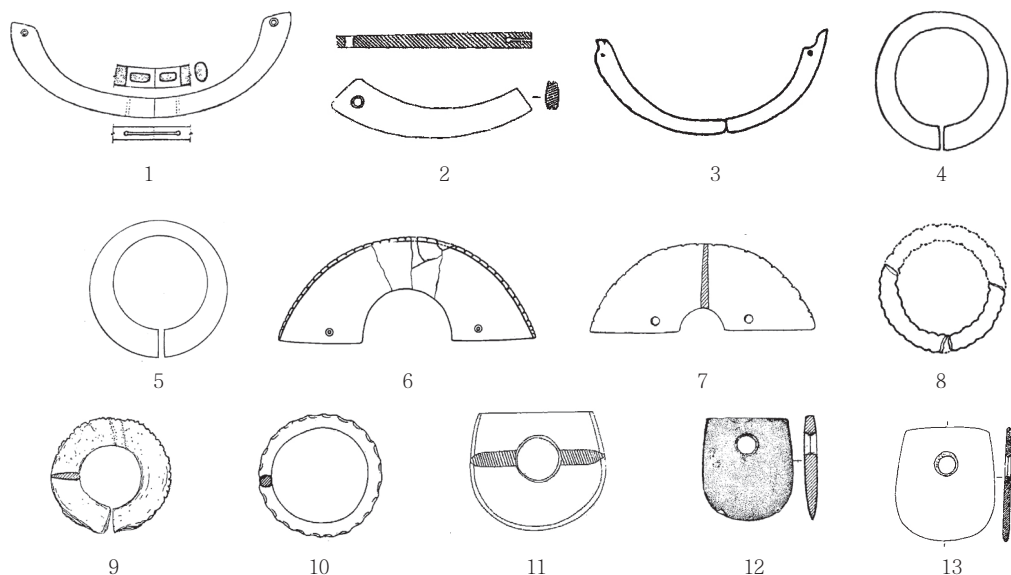
晚，凌家滩玉玦出于③层，晚于宁镇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时期，此种造型流行于台湾、日本、东南亚等地，质地多为玉石、金属等，当是宁镇地区史前文明的南传<sup>[26]</sup>。

3. 花边半璧形玉璜 凌家滩98M14:15、87M11:7几乎一致，半圆形，外缘阴刻一周凹线，在凹边上刻锯齿，外径分别为12.1厘米、11.4厘米、11.3厘米。同类器物还出于南京营盘山<sup>[27]</sup>、武穴鼓山M71:1<sup>[28]</sup>(图二，6)、安徽安庆太湖城西乡金平村遗址<sup>[29]</sup>、四川巫山大溪等地，从分布看，主要在宁镇地区、江淮地区及长江中游，不见于太湖流域。

年代上，凌家滩M11开口于第③层，应该是凌家滩遗址早期，南京营盘山年代略晚于北阴阳营，鼓山与太湖城西大体同时，相当于薛家岗文化二期，按鼓山墓地年代距今约5500~4500年，M71属第一期，最早可至距今5500年左右。巫山玉璜M140:17(图二，7)处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5300年。

由前面可知，素面半璧形璜最早来源于



图二 宁镇地区文化因素相关器物

分体玉璜: 1. 北M191:1 2. 凌87M9:18 3. 凌87M1:4 玉玦: 4. 凌87T11③:8 5. 北M144:1  
花边玉璜: 6. 鼓M71:1 7. 巫M140:17; 8. 鼓M203:16 蚌玦: 9. 巫M177:2  
陶环: 10. 王M2293:2 钺: 11. 凌87M4:24 12. 北M173:4 13. 凌87T1②:4

太湖流域崧泽文化,但锯齿状花边璜却以宁镇地区与江淮地区为早,其他地域的同类器物当由此传播而去。

凌家滩遗址中花边器物还见有凌家滩87T11②:9花边玉环,断面呈三角形,外边缘琢磨87个齿状花边,与锯齿状花边璜使用同种技法,但成熟许多,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

目前宁镇地区并未有发现此类器物。如果不论质地,花边环形器常出现在宁镇地区与江淮中部的周围地区。湖北武穴鼓山薛家岗文化遗址M203:16(图二,8)石环,扁平薄圆形,内外缘皆磨成锯齿状花边,该墓还出有花边陶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除有不同质地的花边环外,花边装饰还见于其他器形,如巫山M177:2蚌玦,(图二,9)边缘有一圈锯齿状装饰,其他牙饰、蚌镯等也常见这种装饰技法。相比之下,海岱地区的花边器物年代更为久远,山东小荆山遗址F 2:39、F2:40皆为花边骨环<sup>[30]</sup>。另外,各种质地的环(镯)是山东王因大汶口遗址<sup>[31]</sup>的一大特色,佩带环类器盛行,常见花边环,M2293:2陶环,(图二,10)外径约6.9厘米,两面均平整,外侧呈圆弧形,压出浅窝花边。

年代上,小荆山遗址属后李文化,时代大约距今8500~7000年。大汶口文化王因遗址陶环(镯)最早出现于③层,如M2163,流行于②层,如M2293,两层年代距今约6000~5500年。凌家滩87T11②:9属于第②层,大溪花边形器出于晚期,距今约5300年,鼓山M203属于第三期,年代距今约4500年。

如此来看,花边器物以海岱地区为早,花边玉器应由此而产生。但成熟的花边玉器,如花边半璧玉璜、花边玉环等,不见于海岱地区,以宁镇地区与江淮中部为早。

4. 石钺 凌家滩玉、石钺数量较多,如07M23有56件之多。凌家滩玉、石钺稍有不

同,前者多为扁长方形,长宽比约1.5~3倍,孔较小;后者多为近扁方形,长宽比约1~1.5倍,孔较大,如87M4:24。(图二,11)

新石器时代晚期,钺在长江下游较常见,从马家浜到崧泽文化都有。从造型看,凌家滩与宁镇地区钺更接近,皆为圆弧刃,刃口由底向两边上延成两面刃或三面刃,琢磨精致,多“风”字形玉钺、大孔石钺,如北阴阳营M173:4(图二,12)与凌家滩87T1②:4(图二,13)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凌家滩玉钺比例高于宁镇地区。

凌家滩钺无任何使用痕迹,放置有一定的规律,如07M23钺多集中于墓主上身,身体中轴线上的钺刃口向上,两侧钺刃分别向外。按中国人以“上”为尊的宇宙观,凌家滩钺不是“刃口向下”的实用器,而是“刃口向上”的礼器,尤其玉钺应是军权或神权的象征。虽然放置有规律,但与良渚文化钺大多出于墓主人的左肩相比,凌家滩钺的使用尚无定制。

良渚文化福泉山M9:18与凌87T1②:4十分相似,而马家浜、崧泽文化少此类,所以凌家滩及宁镇地区钺当为良渚文化玉石钺的源头之一。

虽然长江流域玉文化源头多在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但从凌家滩玉器中很多文化因素直接来自宁镇地区。从这种意义讲,宁镇地区当为凌家滩玉器的次生源头。

另外,以凌家滩为中心的聚落和以北阴阳营为中心的聚落之间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关系,下面补充几点加以说明。

(1) 凌家滩87M1与北阴阳营M70,玉器方面,凌87M1:4与北M70:5各为分体玉璜一半,形致基本相同;凌87M1:10与北M70:3玦、凌87M1:14与北M70:6玉扣形饰也几近相同。年代上,凌家滩87M1开口第②层,是凌家滩遗址偏晚阶段,北阴阳营M70属于北阴阳

营第三层，是二期文化的偏晚阶段，相当于崧泽文化中后期，略早于凌家滩文化。

(2) 虽然北阴阳营二期文化早于凌家滩墓地，贫富分化程度也远低于后者，但随葬玉器比例相似。凌家滩遗址大、中型墓以随葬玉石器为主，大型墓玉器更是高达60%以上，87M4随葬品约131件，玉器96件，约占73.3%。98M29随葬品约87件，玉器58件，约占66.7%。07M23随葬品约330件，玉器200件，约占60.6%。北阴阳营随葬品相对较多的墓也以玉石器为主，M33有随葬品33件，玉器11件，约占33.3%。M74有随葬品39件，玉器有31件，高达79.5%。M57中有随葬品38件，玉器23件，约占60.5%。

(3) 从凌家滩不多的陶器看，从折腹釜形鼎、高圈足壶，到算珠状突起的豆把、折棱、台状的喇叭状圈足等，都与北阴阳营遗址十分相似，如凌家滩98M19:10豆与北阴阳营遗址M109:4豆造型接近。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宁镇地区对凌家滩文化除有源头作用外，两地域间的史前族群可能存在某种亲密关系。

### 三、海岱地区文化因素

大汶口文化玉器并不十分发达，且受东北玉文化影响较深。但从凌家滩玉器看，海岱文化的某些因素对其玉文化影响颇大，具体论述如下。

1. 玉鹰 出于凌98M29，侧首，猪首形两翼，振翅高飞，胸部阴刻八角星形，星纹内外阴刻圆圈，器身共有六孔，应是缝缀在物品上的装饰物。(图三，1)器物虽小，但鹰的造型、猪首翼、八角星纹却透露出凌家滩人深厚的原始精神内涵，下面分别进行论述，以期全面解读。

(1) 鹰造型 较常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从其质地与艺术技法上可以做以

下划分：①雕塑品，以玉器和陶器为主。玉器主要见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辽宁喀左、阜新县胡头沟等<sup>[32]</sup>红山文化中心地带，多为泉，大多两翼竖于两侧，两爪收于胸前，相对年代是红山文化中后段，约为距今5500~5000年。江淮地区凌家滩遗址，属遗址早期墓葬，不晚于距今5300年。江汉平原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sup>[33]</sup>也出土较多，但时代较晚。陶器以山东西河后李文化遗址的鹰面陶塑F56:11(图三，2)为最早，先做圆形泥饼，再用泥条和圆饼做出鹰的圆眼和高鼻，大约距今8500~7000年。崧泽文化南河浜遗址出土3件鹰头壶，M11:5、M15:2(图三，3)、M52:4，皆壶颈部堆塑一鹰头，勾喙，圆眼，小耳，与海岱后李文化手法一致，但成熟得多，三墓相对年代均是该遗址晚期二段，距今约5300~5100年。另外，陕西华县泉护村出有鹰形器盖和鹰尊<sup>[34]</sup>，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②鹰纹，一般刻划于玉圭等仪仗类玉器上面。主要发现于海岱地区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玉铎上的抽象鹰纹(图三，4)<sup>[35]</sup>、临朐朱封<sup>[36]</sup>玉笄上的抽象镂空鹰纹，都极为成熟，时代虽与后李文化较远，但在成熟的鹰纹之前当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鹰纹抽象过程，也就是说，海岱地区从后李文化开始，鹰崇拜就已出现，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变，造型优美的抽象鹰纹得以出现。江苏溧阳<sup>[37]</sup>玉圭上的纹饰与两城镇纹饰极为相似，似玉铎两面纹饰的组合。(图三，5)山西侯马祭祀132坑<sup>[38]</sup>玉圭鹰纹与台湾故宫玉圭上的鹰纹如出一辙。(图三，6)

综上，鹰造型以海岱地区最早，抽象鹰纹的发现更昭示此地鹰崇拜色彩浓厚，这与之前的考古或文献研究成果基本吻合<sup>[39]</sup>。其他出有鹰的地域大多围绕在海岱四周，与海岱文明关系密切。据研究，东北兴隆洼文化与海岱后李文化已有接触<sup>[40]</sup>。至红山文化，

交流更为频繁，大汶口文化通过辽东半岛深入东北地区内陆，如辽东半岛的带把鬻、彩陶上的镂孔等。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海岱文明除向东部沿海扩张，进而向东北进发外，更多地向西、南部蔓延。鲁西南—苏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泰沂文化区，如刘林遗址<sup>[41]</sup>。宁镇地区的海岱因素颇为明显，北阴阳营M79:6双耳壶（图三，7）与大汶口遗址H2026:1相似，这种小口双耳壶是海岱地区的代表器形。

太湖流域的江苏昆山绰墩遗址<sup>[42]</sup>许多墓中人骨存在拔牙习俗，这一习俗最早起源于海岱地区，东贾坡北辛文化墓地<sup>[43]</sup>已有成人拔侧门齿现象，当是这一习俗滥觞。大汶口文化各遗址普遍流行，如王因遗址366个体中，有281个拔牙，高达76.8%<sup>[44]</sup>。绰墩遗址的拔牙现象说明崧泽文化早期，海岱文化因素已辐射至太湖地区，鹰壶、鹰纹玉圭当是这一传播的结果。

海岱文明的向西传播，是沿淮河，至豫东南，逾越大别山和桐柏山，进入江淮地区西部和江汉平原，这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sup>[45][46]</sup>，如此，就不难解释石家河玉鹰中的海岱因素。

另外，凌家滩带把鬻有可能是大汶口人逾越大别山，经由薛家岗带来的文化因素。与凌家滩遗址相邻的淮河中游皖北一带，一直都是大汶口文化的势力范围。海岱文化也可能由宁镇地区、太湖流域辗转至巢湖流域，如此多的传播路线无一不将凌家滩玉鹰指向海岱文明。

（2）猪首鬻 猪，作为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在史前物质与精神文明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目前考古发现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①随葬品或祭祀品，大多由活体猪而来。目前的发现以兴隆洼文化

兴隆洼遗址墓葬<sup>[47]</sup>随葬的猪为最早。海岱地区东贾坡北辛文化墓地<sup>[48]</sup>中，一坑埋有三只整猪，被认为与祭祀仪式有关，当是牺牲寓意的开始。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中盛行以猪头骨或猪下颌骨随葬，各遗址中普遍存在，猪头骨随葬的多少与墓的大小有直接关系，表明猪有财富的寓意。②猪形泥塑，海岱地区西河后李文化遗址F65:23和小荆山后李文化遗址<sup>[49]</sup>F13:2都为陶猪，F13属后李文化晚期早段，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北辛文化时，“猪形鬻”出现，大汶口北辛文化遗址<sup>[50]</sup>T74⑤A:22，年代距今约6470~6100年，王因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T4018H3:131（图三，8）造型与之相同。宁绍平原余姚河姆渡遗址T24④:24<sup>[51]</sup>、罗家角马家浜文化遗址T129④:11等均出陶猪，年代距今约7000~6500年。③猪纹，河姆渡遗址T243④A:2<sup>[52]</sup>陶钵两侧刻划猪纹，较具体，从嘴部看介于野猪与家猪之间。淮河中游双墩遗址<sup>[53]</sup>亦有猪纹，刻划简洁。（图三，9）

综上，猪“牺牲”观念以海岱地区为最早，北辛文化“猪形鬻”还可能为鬻礼器的萌芽。凌家滩玉鹰两侧的猪首寓意可能与海岱文化相同。除此之外，凌家滩遗址中还出有2件玉猪87M13:1和07M23:1，表明猪在凌家滩文化除了牺牲之外当有其他功能。

（3）八角星纹 凌家滩玉器中，除玉鹰胸部外，八角星纹还见于长方形刻纹玉片（87M4:30）。关于八角星纹的族属，笔者就目前的考古证据分析如下。海岱地区的八角星纹多见于彩陶，最早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流行于早、中期，距今约6300~5500年，如泰安大汶口遗址<sup>[54]</sup>M2005:49红衣白彩陶豆、王因遗址<sup>[55]</sup>M188:2红衣陶盆（图三，10）、野店M35:2陶盆等，多是在器物外腹绘三至四个八角星纹，中间以竖线或圆区隔，八角形中间有圆形或方形图案。除此之



外，大汶口遗址还出有直接彩绘两个亚腰形相交的八角星纹。大汶口文化中期，胶东半岛开始受到鲁西南大汶口文化的冲击<sup>[56]</sup>，出现八角星纹，如北庄遗址。

长江流域的八角星纹最早发现于大溪文化（距今约6300~4600年）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sup>[57]</sup>，时代是大溪文化早期，陶盘内底两个亚腰形相交成八角星纹，其间用几何纹饰填充。之后的八角星纹主要出于下游，多刻划在纺轮或器盖上，如昆山绰墩98M19:3<sup>[58]</sup>陶纺轮，巧妙利用纺轮的内外轮廓与八角星形，组成了一个具象的太阳，与凌家滩八角星纹近似，该遗址属于崧泽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采集 I 1343器盖绘有十角星形。（图三，11）太湖流域八角星纹偶有出现于壶或豆上，如崧泽M33:4陶壶底及T2的灰陶豆柄下部<sup>[59]</sup>，二者均属崧泽文化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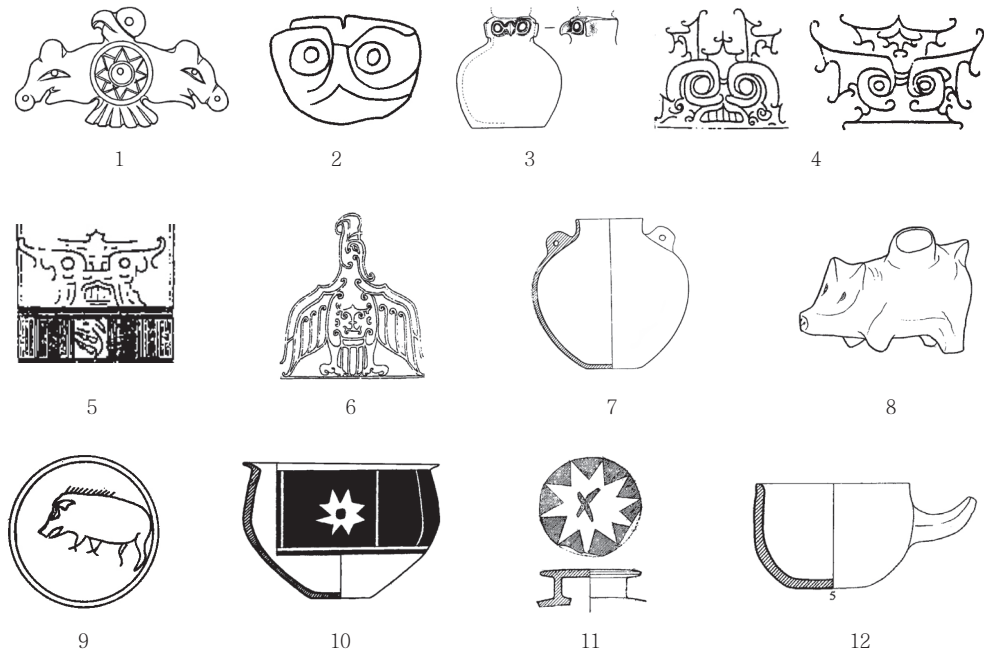
赣鄱流域也有出现八角星纹，时代较晚，

主要在陶纺轮上，如江西永丰尹家坪遗址<sup>[60]</sup>。纺轮上刻划纹饰，以屈家岭文化最有代表性，但屈家岭遗址<sup>[61]</sup>并无八角星纹出现，赣鄱流域八角星纹当不是由长江中流而来。

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文明推至薛家岗文化。薛家岗遗址M116:4陶钵与山东王因M2401:6（图三，12）造型相同，甚至跨过长江，安徽黄山蒋家山遗址的空袋足鬲和日月图案的大口尖底罐等<sup>[62]</sup>，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器形。赣鄱流域的八角星纹可能是由江淮转折而来的海岱文化因素。

除上述地区外，中原仰韶文化大河村遗址也出有八角星纹，高广仁、邵望平二位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来源于此<sup>[63]</sup>。但据大河村报告<sup>[64]</sup>，八角星纹出现于大河村仰韶文化第三期，距今约5100~4700年，晚于海岱地区，应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而来。

综上，八角星纹起源于何地尚有争议，但成熟八角星纹以海岱地区为早。大汶口文



图三 海岱地区文化因素相关器物  
 鹰形器（纹）：1~6. 凌98M29:6 西F56:11 南M15:2 两城玉钺纹 溧鹰纹 台故宫玉圭鹰纹  
 小口双耳壶：7. 北M79:6 猪形器（纹）：8、9. 王T4018H3:131 双墩猪纹  
 星纹：10、11. 王M188:2 北采 I 1343 角把陶钵：12. 王M2401:6

化时期，成为海岱太阳崇拜的主要标志之一。随着大汶口文化的扩张而四处传播，凌家滩遗址是大汶口文化南下落脚点之一，凌家滩人巧妙引用这一图案，融入自己的精神文化中。

对于八角星纹的功能，一般认为是史前太阳崇拜的物化形式之一，如有人认为表示太阳不断循环，是一年四季变化的象征，由此进一步认为“卍”字纹<sup>[65]</sup>由此简化而来。当然也有人认为八角星纹不包含太阳崇拜的内涵，而与龟甲囊的组合形式有关<sup>[66]</sup>。

要之，玉鹰透露出凌家滩人与大汶口人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单纯物质的，而是原始精神的，共同或相似的原始崇拜与巫术祭祀。

2. 玉龟（形器）、玉筓 这一类器物出土不多，仅出于2座大型墓中。87M4有一玉龟，背甲与腹甲可以分开，出土时内有长方形刻纹玉板。07M23有一玉龟，背甲与腹甲一体，内附2个玉筓。2件玉龟形器上腹面呈半圆弧形，下腹面较平，器体一端平口，另一端为斜口，内各附1~2枚玉筓。发掘者据此推断87M4:36玉筓也应为玉筓。

龟类组合器是原始占卜工具，已是学界共识，这证明了凌家滩先民原始宗教“灵龟”文化的存在，而这一文化源于海岱地区，是其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考古资料，龟甲最早出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sup>[67]</sup>，所属裴李岗文化<sup>[68]</sup>。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中随葬龟壳屡见不鲜，如东贾柏墓地<sup>[69]</sup>坑中埋有多个龟壳。不论裴李岗还是北辛，都是大汶口文化的来源，后者是主要源头，证明海岱“神龟”文化由来已久。

大汶口文化时期，随葬龟甲更为普遍，大汶口遗址、兖州王因遗址、邹县野店、花厅遗址<sup>[70]</sup>等都出有龟甲，多成对（套），一般分为腹甲与背甲两部分，背甲下缘有穿

孔，靠近尾部中侧，各穿对称两孔，龟甲内多有石子或骨针、骨锥等，墓主多为男性。如王因遗址3套（腹、背甲各3）龟甲分别出于M2151（男性单人墓）、M2301（男性双人墓）、M2514（男性五人墓），其中M2301内有11件骨锥。从随葬情况看，有龟甲的墓葬，随葬品较多，可见墓主地位较高，应是巫觋中“覡”，即男巫。大汶口中期开始，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氏族首领可能手中握有神权，也握有军权，即二权合一。

通常说，人的知识或对事物的认知来自于后天。人作为文明传承的载体，个体的人人会消逝，但群体的心理、文化结构会传承下去。每个人出生后，自觉不自觉地吸收所在环境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人”。在由“自然的人”至“社会的人”过渡过程中，个体所属的族群文化最先、也最牢固地扎根于个体心理。这种认知在个体成熟后，不会随着个体的迁移而消失，而是四处传播，选择合适的载体物化出来。而凌家滩人利用丰富的自然矿产将海岱文明的原始宗教与巫术观念物化为玉器。

凌家滩与海岱精神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鹰图腾、猪“牺牲”、八角星纹、“龟灵”等，无一不显示了海岱原始精神对凌家滩玉文化的影响。总之，相较于其他文化对凌家滩玉器的影响，海岱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精神方面，较为抽象的，不易觉察，只能通过抽丝剥茧，才可以由表面及本质。除精神内涵外，凌家滩遗址的某些陶器造型同样体现出海岱文化因素。

凌家滩带把鬻与薛家岗文化<sup>[71]</sup>极为相似，如凌M25:18带把鬻与薛家岗M113:3几乎相同，是薛家岗一期Aa式M5:1与二期B式M65:5的组合。据学者研究<sup>[72]</sup>，鬻最早出现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角状把手鬻就已出现，多是壶形、圜底、实足，无流、角

状把手，如出土角状把手鬲最多的是王因遗址上文化层（①~④层），共有196件之多，占鼎的28.1%，是该遗址的代表器形之一，角状把手多上翘，如M2266:3。王因遗址上文化层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江淮地区的角状把手鬲应是受海岱地区同类器物影响。

总之，凌家滩文化时，海岱文明进入鼎盛期，文化急剧扩张，包括族群的迁徙。凌家滩遗址的发现，为大汶口文化西进的一个文化“驿站”，也使扩张路线更加明朗化，大汶口文化通过鲁西南经由淮河下游，进入宁镇地区，在此可能分为两支，一支沿江而下向太湖流域传播，另一支则溯江而上，对凌家滩文化造成影响。

#### 四、东北地区文化因素

严格来说，凌家滩玉器中的东北玉文化因素极为微弱，有些是不确定的。随着玉文化研究的深入，显示出东北玉文化通过海岱对南方地区的影响。此处将这些微弱、模糊的因子做一介绍，抛砖引玉，与方家学者商榷。

1. 玉璧（形器） 凌家滩玉璧数量少，大墓也极少出土，87M4中96件玉器仅有2件，98M29中58件玉器有5件，07M23中200件玉器仅有2件。制作较粗，外径约从5~11厘米，内径约0.5~2.5厘米之间，璧面有数量不等的孔，分布不规则，当是缝缀在衣物上的装饰。

与凌家滩文化相邻的长江下游，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均少见凌家滩玉璧造型。更远的方向，东北地区璧形器较为流行，多近圆方形，剖面亦呈三角形，外缘呈刃状，璧面上侧钻孔或无孔，应是串饰中的组件。

海岱地区玉璧形器时有出土，型制与东北地区相似，应为东北玉文化因素，从玉质多为岫玉看，可能部分是由东北直接输入

的舶来品。但石璧不同，如大汶口遗址串饰M47:9、M47:12中的石璧，圆形，均无孔，应由本地生产。凌家滩玉璧与海岱地区相似，但功能有所不同。是否是经由海岱而来的东北文化因素，有待更多的证据。

2. 玉联璧 凌家滩遗址众多玉器中，87M15:107显得极为特殊，由上下两个环形器组成，小环直径3厘米，大环直径3.6厘米，原报告称玉双连环，与东北联璧极为相似，应为联璧。

联璧（连璧），是璧的连体，目前常见二联、三联，偶见四联。主要出土地点自北向南有黑龙江泰来县东翁要山<sup>[73]</sup>、杜尔伯特旗毛都西那屯、杜尔伯特旗江湾乡九扇门村<sup>[74]</sup>、尚志县亚布力<sup>[75]</sup>、东翁根山1号遗址<sup>[76]</sup>，吉林通榆县张俭陀子<sup>[77]</sup>，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sup>[78]</sup>、第十六地点M1<sup>[79]</sup>、阜新胡头沟积石冢<sup>[80]</sup>，山东邹县野店M22、江苏花厅M45、南京营盘山、海安青墩<sup>[81]</sup>，安徽蒙城尉迟寺<sup>[82]</sup>、凌家滩，湖北黄梅塞墩M123<sup>[83]</sup>等遗址。

从地域分布看，联璧与玉璧（形器）的分布有相似之处，依次为于东北地区、海岱地区，外延至江淮地区，出土数量也是依次减少。

从造型说，多数联璧单孔近方形，少数为圆形。可以分为三型。

A型：器体扁平，上小下大，竖排二至四孔，分界处两侧边缘有“V”形痕，是联璧的常见造型，以东北为中心，分布最广，如阜新胡头沟遗址所出三联璧。（图四，1）

B型：扁平状，一侧或两侧较直，依次有二至三孔，在一侧又有系带孔。目前见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与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后者两孔中间也各有砣痕。（图四，2）

C型：呈“8”字形，似两圆璧相连，仅见

于毛都西那屯（图四，3）与凌家滩遗址中。

之前的研究一般将联璧归于红山文化范畴。从黑龙江等地所出联璧看，上限超出了红山文化，如尚志市亚布力遗址的三联璧距今约7000年<sup>[84]</sup>，巧合的是璧形器也以黑龙江地区为早。东北地区中部以南联璧约在红山文化范畴内，距今约5500~5000年，海岱及江淮地区也多集中于这一时期。

由上可知，联璧与璧形器的源头当在更远的东北地区。近年来，东北亚考古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些证据，距今38000年左右的俄罗斯远东地区阿尔泰Denisova洞穴<sup>[85]</sup>出土饰物中，有1件骨联璧，另外1件虽小，似鱼形，但从图片看，器物的尾部应是孔的残边，笔者推测也应是1件两孔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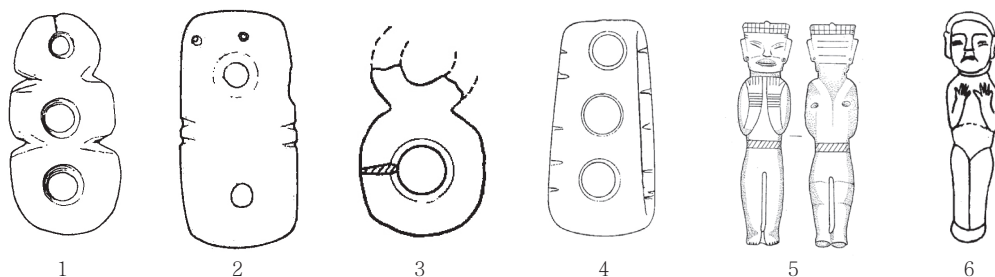
以上骨联璧与中国东北流行的玉联璧极为相似，虽然二者时代相距遥远，缺环太多。但从成熟的兴隆洼玉文化之前应有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间来说，玉器的起源当在更远的时代。将整个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不排除联璧是由更远的地方传至东北地区的可能。

综上，笔者做如下假设，联璧或璧（形器）当起源于东北亚，一路南下，至黑龙江地区，融入红山文化，至海岱地区，经由海岱文化的扩张捎带南下，至江淮地区。有学者指出<sup>[86]</sup>，湖北黄梅塞墩的三联璧显示了江淮地区与海岱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联系，部分论证了笔者上述的联璧传播路线。

任何文化传播过程中，越到外缘，影响力越微小，联璧也不例外。海岱地区与江淮地区的大部分玉联璧与东北所差无几，或由东北文化直接输入，也产生变体，如大汶口遗址M47:11是男性墓主头部的串饰，其中有4件三孔、1件二孔的大理岩长方形片饰，形状与B型相似，（图四，4）应由联璧衍生而来。凌家滩联璧玉质灰白、不透明与浅绿色、半透明的岫玉不同，应亦为东北文化因素的变体。

3. 玉人 凌家滩遗址共出玉人6件，98M29和87M1各有3件。98M29三件略矮应为坐姿，87M1三件皆为立姿。（87M1:1，图四，5）造型基本相同，头部戴相同造型的冠，冠中间一突起，方脸，长眼粗眉，蒜头鼻，大嘴，两耳各有孔眼，表示戴玦类或瑁类耳饰，两臂弯曲，双手上举，十指分开置于胸前，腕上各饰六到八条不等的条纹，表示环、镯等饰物，腰部饰有条纹以示腰带，皆赤足。

玉冠形饰象征着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能力，佩带冠形饰的玉人当是拥有“通神”或“通天”能力的巫覡。98M29规模较大，墓中出有玉鹰、钺、戈、鏃、铲等，说明墓主人不但拥有“通神”、祭祀图腾的等神权，还握有军权，是巫覡也是氏族首领。联系到07M23墓主手腕处的玉环与玉人手腕处的刻划线相吻合，证明玉人当是氏族首领的形象，



图四 东北地区文化因素相关器物

联璧：1~4. 阜新胡头沟 蒙F64柱5:1 毛（采） 汶M47 玉人：5. 凌87M1:1 6. 牛M4

极可能是已逝氏族首领，即祖先神。双手上举，一般认为是进行某种巫术活动时“通神”的姿势。

凌家滩玉人形象在毗邻地区出土不多，隔海岱相望的红山文化辽宁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M4出有一件，造型较简单，（图四，6）无冠，直立，装饰较少，相似之处是双手上举于胸，当也是巫覡或首领形象。杨伯达先生认为玉人“双手抚胸的动作是东夷部族巫覡通神时获得成功的姿势”<sup>[87]</sup>，这一观点建立在将东北划为东夷玉文化板块基础上。

由于地域较远，东北与南方的交流并不明显，大多是由海岱文化捎带而来。但近年的考古发现似乎表示东北与海岱以南地区有更多的文化涌动有待发现。

（1）内蒙古白音长汗<sup>[88]</sup>M2:10残石臂钏内外缘皆有纵向凹槽，与江淮地区流行的花边器形十分相似。M2:6为一螺纹石棒饰，其上两孔之间有凹槽相连，其形状与分体玉璜中的第二类连接方式几乎一致，不同的只是前者器物为一体，而后者从中间一分为二。M2为白音长汗二期，距今约7000年。

（2）凌家滩87M9:18玉璜一侧鸟首，一侧龙首，龙首类似红山玉猪龙的猪首。一般认为，凌家滩部落的图腾是鸟，那么龙首璜是否以为猪龙著称的红山文化中的某个部落呢？

种种迹象将中国大陆东部连为一线，许多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台湾邓淑苹女士认为东夷的鸟图腾应该向更远的东北地区寻找证据<sup>[89]</sup>。杨伯达先生更是将东北地区划入东夷玉文化板块。如此，作为淮夷先人的凌家滩人与东北夷先人的红山人应有共同的文化传承，但要进一步确定这种观点，尚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另外，从东亚考古研究来看，东北玉文化与长江下游玉文化向太平洋扩散的汇聚点之一可能在朝鲜与日本。河姆渡文化玉璜多

只有一孔，如余姚河姆渡T1④:95与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日本的桑野遗址和三引遗址都有出土<sup>[90]</sup>，是流行于朝鲜与日本的曲玉前身。

## 五、小 结

从凌家滩玉器外来因素分析可以看出，太湖流域、宁镇地区与海岱地区文化因素占主要地位。太湖流域、宁镇地区的主要表现为玉器种类、造型的源头作用，海岱文明对凌家滩文化的影响除了较多表现在原始精神方面外，还担负着东北文化因素的“驿站”作用。总之，在周围多方强势文化冲击下，长江下游的玉文化系统与海岱地区精神文化系统相结合，汇聚成了璀璨夺目，别具特色凌家滩玉文化；成熟的凌家滩文化又融入文明起源的洪流中，向四周辐射，与周围文化交流、再次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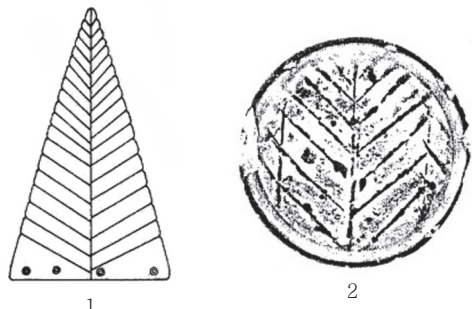
正如前所说，由于淮河流域地理环境复杂，各地域间的文明进程多不平衡，各成体系。随着淮河各地域文化的崛起，“多元”聚合的淮河文明渐露端倪。在此过程中，多个族群迁徙或途经此地，整合、重组，形成了淮夷族群。从前文分析看，除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此的当地人外，还应包括：

（1）海岱文化因素的存在显示二者之间有部分共同的族群，即凌家滩人中存在部分从海岱迁来的古东夷人，这可能是后来淮夷人的基础来源之一。（2）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文化因素说明长江下游的部分族群逆流而上，进入江淮中部，即凌家滩人中存在部分古越人。另外，凌家滩玉器与历史时期越式玉器的相类，说明部分凌家滩人迁徙至太湖流域，成为先越的组成成员之一。（3）凌家滩与宁镇地区文化因素的极度相似，说明二者之间存在远比文化交流更深的关系，极有可能聚落中心的迁徙，原由简单论述如下：

首先，玉文化与社会结构方面，北阴阳营文化明显落后，说明二者社会形态发展的前后；其次，大汶口文化中后期海岱文化急剧增强，而北阴阳营三期以后文化却开始衰落。强势海岱文明极可能迫使宁镇地区族群的南迁或西迁。而凌家滩遗址与北阴阳营文化的相似，足以说明以北阴阳营为中心的聚落重心可能转移至以凌家滩为中心的巢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挟带海岱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及先进的社会结构，在当地文化基础上，创造凌家滩文明。（4）多重“多元一体”的格局造就了淮河文明的复杂性，各地理单元内多有互动。凌家滩玉器中包含有淮南丘陵以北地区微弱的文化因素，具体表现如下：凌家滩87M4:68三角形玉器上的纹饰（图五，1）与双墩遗址<sup>[91]</sup>陶器刻划纹中的叶脉纹（图五，2）92T0723②:20十分相似。另外，双墩遗址还有较多猪纹，表明猪在双墩文化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双墩遗址年代距今约7300~7100年，与同一地域的侯家寨遗址（距今约6900~5200年）属同一文化系统。虽然文化因素十分微弱，但不排除在漫长岁月中淮河中游先人越过淮南丘陵到达巢湖流域的可能。不仅如此，高广仁、邵望平二位先生认为“年代早、研究成熟的淮系史前文化”是裴李岗文化<sup>[92]</sup>。他们认为“有一部分裴李岗的后裔，或者仅仅是文化的影响，抵达淮南丘陵地区，发展起了

侯家寨文化”。倘若如此，凌家滩人中可能还包括部分裴李岗人后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凌家滩文化虽只是淮河文明进程中的一环，不能完全代表淮系文明，但整个淮河流域的文明进程大同小异。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文明交流与碰撞空前繁盛，族群迁徙异常频繁，地处黄河与长江中间的淮河流域成为多个族群交流与迁徙的必经之地，挟带高度发达的黄河、长江、辽河等文化因素的多支族群，在此汇聚、融合与重组，最终创造了兼容并包又独具特色的淮夷文明。



图五 淮南丘陵以北淮河中游地区文化因素相关器物  
1. 凌87M4:68三角形玉器 2. 双墩叶脉纹92T0723②:20

-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 1989,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含山县文物管理所.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考古, 1999,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 考古, 2000, (3).
-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凌家滩文化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3] 江阴博物馆, 无锡市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之一: 祁头山.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4] 史前双璧.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图版82.
- [5] 四川省博物馆. 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 考古学报, 1981, (4).
-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7] 史前双璧.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图版31.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 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 2007.
-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10]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 1982, (3).
-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越墓.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1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市针织厂东周墓的清理简报. 文物, 2001, (12).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

- 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1997, (4). 浙江省文管会,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绍兴地区文化局, 绍兴市文管会. 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84, (1).
- [13] 古方主编.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14] 南京博物院等. 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 文物, 1986, (10).
- [15]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二: 反山(上、下).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16] 张明华. 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17]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 瑶山.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18]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19] 南京博物院. 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 [20]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 大汶口.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4.
- [21] 史前双璧.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图版32.
- [22] 南京博物院. 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 [23] 俞伟超. 凌家滩玉器是结盟、联姻的信物. 凌家滩文化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24] 南京博物院等. 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之一——祁头山.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25] 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 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文物, 2004, (2).
- [26] 杨建芳. 耳饰玦的起源、演变与分布. 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下). 台湾: 众志美术出版社, 2001.
- [27] 罗宗真. 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的初步研究. 东亚玉器(I). 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 1999.
- [28] 湖北省京九铁路考古队. 武穴鼓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29] 古方主编.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6).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30] 济南文物局文物处、章丘博物馆. 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第一次发掘. 东方考古第1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说明: 从王因遗址报告中看, 其镯类当是此处所说环(镯)类, 而报告中的石环, 应称小璧形器更合适.
-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32] 古方主编.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33] 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等编著. 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34] 北京大学考古系,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华县泉护村. 科学出版社, 2004.
- [35] 刘敦愿. 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 考古, 1972, (4).
- [36]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 考古, 1990, (7).
- [37] 汪青青. 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 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6.
- [38] 古方主编.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3).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39] 邓淑苹. 再论神祖面纹玉器. 东亚玉器(I). 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 1999.
- [4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41]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 考古学报, 1962, (1).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考古学报, 1965, (2).
- [42] 苏州博物馆等. 江苏昆山市绰墩遗址发掘报告. 东南文化, 2000, (1).
- [43] 中国社科院考所山东队. 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9, (6).
- [44] 韩康信.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人骨鉴定报告. 山东王因.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45] 高广仁, 邵望平. 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46] 许永杰. 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初探. 考古学报, 2010, (2).
- [47] 中国社科院教研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5, (10).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 考古, 1997, (1).
- [4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 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9, (6).
- [49]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 章丘市博物馆. 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1996, (2).
- [5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7.
- [5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52] 罗家角考古队. 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 浙江

- 省文物考古所学报(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53] 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5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56] 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胶东考古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4.
- [57] 何介钧,周世荣.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4).
- [58]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昆山市绰墩遗址发掘报.东南文化,2000,(1).
- [5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60]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永丰尹家坪遗址试掘简报.南方文物,1986,(2).
-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 [62] 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初探.考古学报,2010,(2).
- [63]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6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何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65] 蔡英杰.太阳循环与八星纹和卍字符号.民族艺术研究,2005,(5).
- [66] 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凌家滩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6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 [68] 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凌家滩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69]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6).
- [70] 南京博物院编著.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7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72] 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4).
- [73] 孙长庆等.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74] 孙守道.中国史前东北玉文化试论.东亚玉器(I).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1999.
- [75] 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尚志县亚布力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8,(1).
- [76] 于建华.黑龙江省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2,(4).
- [77] 王国范.吉林通榆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4).
- [78] 辽宁省考古所.牛河梁遗址.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 [79]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80] 方殿春.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掘.文物,1984,(6).
- [81]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8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蒙城县文化局主编.蒙城尉迟寺(第二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黄梅塞墩的薛家岗遗址等文化墓地.考古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 [84] 常素霞.中国玉器发展史.北京:科技出版社,2009.
- [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
- [86] 田名利.略论皖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江汉考古,2002,(1).
- [87] 杨伯达.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8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89] 邓淑苹.再论神祖面纹玉器.东亚玉器(I).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1999.
- [9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
- [91] 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92] 高广仁,邵望平.析中国文明主源之一——淮系文化.东方考古第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方燕明)